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民间史料绝不应缺席 ——兼论民间史料与官方史料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的互济

张学见

(三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摘要]相比于传统以领导人年谱、党代会文件汇编、政府工作报告为代表的官方文献资料,民间资料无疑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增添了一股新的史料来源。从民间史料话语表达、问题意识以及其所彰显的生动情态等方面来看,其纳入改革开放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作为研究者,要想把民间史料妥善运用于改革开放史研究之中,还需尽量提升其相关学识能力;妥善对待民间文本内容的分歧性;努力约束好个人情感。固然,民间史料对改革开放史研究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可以轻视官方文献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实际上,民间史料与官方史料在很多情况下存在着互济关系,它们可以一并纳入改革开放史研究之中。这样,不仅能够构建一部更加全面、完整的改革开放史,还可以裨益中华民族在未来改革开放赓续的道路上更加“行稳致远”。

[关键词]民间史料;官方史料;改革开放史

[基金项目]2017年度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民间史料与中共党史研究》(20171114)

[作者简介]张学见(1979—),男,河南信阳人,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8)06-0006-06 [收稿日期]2018-04-18

改革开放即将40周年,40年在当代中国已成为一个较长的历史单元。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而言,由于改革开放史在中国当代史、中国史乃至在人类历史的文明进程中都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价值,关于其历程、经验乃至存在的问题都可以亦应该从学理上全面加以梳理和检讨。职是之故,笔者近年来一直潜心于当代民间史料的搜集、研读与思考,对民间史料纳入改革开放史研究初步形成了一定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以回忆录、家谱、书信、日记、调查报告、账本等为代表的民间史料不断公开面世,而这些出自社会公众之手的海量文本题材,散发着变革历程的时代体温,流淌着普通民众的生命感悟。相比于传统以领导人年谱、党代会文件汇编、政府工作报告为代表的官方史料,它无疑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增添了一股新的史料来源。那么,民间史料有哪些内在属性,其纳入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意义和价值在哪里?民间史料与官方史料存在着怎样的互济关系,以致可以一并纳入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之中。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有专文申论。本文就此予以论析探研,以期抛砖引玉。

一、民间史料的文本特征决定了其纳入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中的必要性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民间史料绝不应缺席。

固然有近年来“史观”的变化,强调史学研究不仅要“由上往下看”,还要“由下往上看”,但更为重要的是,民间史料文本自身特征决定了其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有存在的价值。这里不妨以民间史料文本特征之三个维度——民间史料的话语表达、民间史料的内在“情态”和民间史料的问题意识等来审视民间史料纳入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必要性。

(一)民间史料之话语表达

“话语”,一般认为是话语表达主体通过一定方式表达对某事物的认识、看法,从中体现“自己的关注点、价值观”,并期望获得一定的社会效果^[1]。而根据福柯的经典描述,话语与权力通常是紧密相关的,是相关依赖、相互生产的关系,在很多情况下“话语的运用作为权力运作的一种形式”^[2]。应该说,西方学者建构一些概念为我们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但不能什么时候都可以不作任何分析地拿来为我所用,否则会陷入“话语陷阱”。如果说官方文献不仅是传播信息的载体,同时也可以理解一种用权力建构的“话语”,即通过话语表达可以窥探文本资料背后权力运作的逻辑。但作为民间史料而言,由于其内在的属性,其话语表达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权力运作的隐秘逻辑,故话语与权力并非时时处处都是相互依存、相伴相生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当代中国社会

政治文明进步,诸多民间史料得以通过各种方式问世,这些文本内容出自不同人群,甚至不乏草根之手。可以说,芸芸众生既是改革开放的主体力量,也是表达改革开放的重要群体。虽然不少民间文本资料创作主体身处“江湖之远”,却不乏话语表达之意愿,为此其通过各种途径,使民间文本资料得以公开面世。这些民间文本或表达一种理想,或表达一种情怀,或表达一种诉求,或表达一种生活样式,等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民间文本资料可以视作文本创造主体向外界、向公众进行话语表达的一种载体、一种方式,而这些是构建改革开放史不可或缺的元素,世人从中亦不难体味到改革开放历史巨变的时代气息。

史学研究,重在以史料为基础,史论结合。这里,不妨结合具体例子略作说明。比如,民营企业家王石,其商业经营活动肇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在历经 30 余年商海生涯后,他于 2014 年出版了两本自传——《道路与梦想:我与万科(1983—1999 年)》、《大道当然:我与万科(2000—2013)》。这既可看作是一个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中的成长史;亦可理解为公司主要经营者的王石在商海沉浮 30 余年后,试图对社会公众进行自我话语表达,企图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企业家群体寻求一种自我定位和身份认同。在商业经营实践中,王石始终坚持“绝不行贿”原则^{[3] P405、27、48、56};关于契约精神,从 1980 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他由本能排斥到逐渐认同^{[3] P396—398};关于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他认为企业家为社会提供了就业与财富,企业家精神更是社会进步的动力^{[3] P407}。这些话语表达,一方面可以说体现了一批具有新思维、新审美、新情怀的新一代企业家群体在改革开放历史时空中的成长;另一方面亦可说是改革开放赋予了这些企业家新的时代元素和独具时代特色的话语表达。通过对改革开放大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的生动诠释,从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时代变革和前进的脚步声。因此,以民间史料话语表达为视角,是改革开放史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切入点。

(二) 民间史料之内在“情态”

史学研究不仅要聚焦于“政治家的作为、制度的运行”,更要探究社会普通公众“对生命存在的感受”^[4]。真正的历史记忆,绝非官方史学记述所能构建起来的,也不是高度简约所形成的若干概念、规律所能完全覆盖的,而是源于大众的社会实践、生产实践、文化实践和生命实践。改革开放 40 年,对这场伟大历史变革的研究和探索,需要官方资料的宏大叙事,亦需要民间资料之内在所固有的生动情态,以还原一部鲜明、生动的历史全景。梁启超曾感叹写史“摹体尚易,描态实难”。一般来说,对一个历史要件宏观的、轮廓的构建、还原,

通常并非难事,但历史见证者、参与者的“态度、神态、言行”乃至心态、情绪等,则是“历史中最难把握的知性方面”。这些最具历史现场感的“生动情态”,通常是后人“难以准确摹写和真切感受到的”。而“历史记述一旦缺乏情态,也就成了所谓‘得肉遗血,得骨遗髓’的粗劣摹本”^[5]。一般来说,能够凸显历史生动情态者,除了时而隐之于在官方文献之中,主要还是大量记载于民间文本资料之中。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重铸了当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和面貌,也改变了亿万民众的人生命运,不少民众通过不同类别的个人文本资料,或表达对改革开放的责任和担当,或叙说在改革开放中的希望和迷惑,等等。而这些独具个性化特色的言说内容,往往迥异于官方文献的庄重,也少了体制背景的严谨,所以其不仅是打开社会公众思想认知和心灵的一把钥匙,也成为我们从纵深层面研究改革开放史不可或缺的“历史知性”的珍贵材料。

春江水暖鸭先知。企业家是市场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亲历者,其所思所想、所言所论往往最能真实“再现”改革开放的不凡历程。那么,我们不妨结合一些有关民营企业家的文本资料,来管窥其生动情态,是如何有裨益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颁布了诸多有关经济体制、管理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改革等方面的政策、法规等文献资料,已成为我们研究改革开放经济转型的重要依据。但若仅局限于此,则很难从中看到作为市场经济重要经营主体——企业家群体的心态、情感、价值观等“知性”的一面,而这些恰恰是从人性角度深度探究改革开放史不可缺少的。如《希望永行——中国首富刘永行自述》曾记载作为民营企业家刘永行的苦闷,早在 1980 年代,希望集团已为“社会创造很大财富的中国本土企业”,“解决了几百个员工就业问题”,而“所有这些,都不能得到人们的尊重”。富有戏剧性的是,1991 年希望集团与外资正大集团打了一场价格战,并成功击败后者,希望集团由此“得到人们的认可”。但刘氏心情则十分沉重,其直言,“我们做企业,关键是为社会增加财富,而不是为了打败这个企业或者那个企业”^{[6] P107}。这说明,在 1992 年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公开、正式提出之前,本为平常的中外企业之间的一场商业竞争,却被人为注入了政治色彩,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企业家的自我定位。管中窥豹,正是由于来自改革开放这些参与者、亲历者的“真情流露”,改革开放不少富有历史意义的现场情态才得以保存下来,而这些动人、鲜活、真实的历史场景则成为深入研究改革开放史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

(三) 民间史料之问题意识

研究改革开放史,主要是利用官方文献资料,但亦应倾听来自民间社会的声音,注意把民间史料的问题意识纳入改革开放史研究之中。这里民间资料的“问题意识”从本质上讲,是民间社会大众通过“自身场域”、自身实践乃至自身情感,来观察、省思改革开放的一种方式。众所周知,改革开放成就巨大,民众从中受益良多,故不少民间文本资料对改革开放之成就发自内心予以肯定、赞扬;但这并不意味着民间史料问题意识仅限于此,实际上一些民间文本资料立意辽阔、视野高远,其对改革开放史若干侧面作了个性化的、深度思考,不仅看到改革开放之巨大成就,亦对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予以不同程度上的探究。应该说,后者所涉及的“问题意识”对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显然更大一些。因为对于前者而言,诸多新时期官方文献已有所论及。因此,在这里不妨着重谈一下后者所涉及的“问题意识”对改革开放史研究的价值。对此,张静如曾直言,“改革开放之后的历史时期里,对存在问题不是没有说,而是说的不够。越是社会顺利发展的阶段,越应该把不足之处说到位,这才更有利于继续发展”^[7]。

改革与开放,成就与问题,本身是相依相伴、互生互灭的。中外古今,从来没有任何一项社会改革只有成就,没有问题。可以这样说,近40年来,民众生逢改革大业,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参与者、感受者、记录者。而不少民间资料则系文本研制主体深入改革开放实践,调查、研究基础之上而形成的,其真实、生动地记载了改革开放不同的侧面,充满着对改革开放理性反思、客观探讨,这些民间史料所凝聚的“问题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解、理解和诠释改革开放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

理论探讨不能孤立于实证案例。在这里,不妨略举一些具有较高问题意识的民间史料,以管窥其对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如社会学家曹锦清于1996年赴河南农村经过近一年远离官方背景的民间访谈、调研,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最终形成《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一书。该书记载了1990年代末中原地区农民与土地、农民与市场、农民与人情网络、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的影

也正因如此,诸如此类的民间文本资料以及它所承载的问题意识,后世之人只有结合相关官方文献才可看清改革开放史的真实样态及其演进逻辑。

二、民间史料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中的有效运用:研究者的视角

将民间史料纳入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民间史料能否真正有效地纳入改革开放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研究者的学识、见识和能力。当代人研究尚未凝固的改革开放史研究,一方面固然存在不少便利因素,同时也对研究者提出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诸如研究者需要有较宽阔的知识储备、较好的史料处理能力、较强的自我情感把控能力,特别是具备国内和国际两个宏观层面的视野,具备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思维的理论基础。

(一) 不断提升研究者的学识能力

当代民间史料创作主体多元,文本内容旁骛繁杂。有的民间史料内容出自专业学者,如法学家江平所著《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内中多含大量法学专业知识;有的文本内容出自企业家之手,其间多涉市场经济理论知识,如前述王石两本横跨1983—2013年间的个人自述;有的文本内容则对当代县域政治生态进行大量调研与观察,如李克军所著《县委书记们的主政谋略》,其中有不少现代政治学相关知识,等等。面对不同知识系统和谱系的当代民间资料,作为个体研究者要想将之准确、有效地整合、运用于改革开放史研究之中,殊非易事。首先,改革开放史研究者应尽可能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丰富自身知识背景,以达到自身知识系统与当代民间文本内容相互牵引、相互激活。实际上,不少在学术上有重大造诣的前辈学者,往往知识渊博,治学跨越多种学科门类,如梁启超、陈寅恪、季羨林等。当然时至今日,不可能要求每一个治改革开放史的学者都能具备如此贯通之才,但高山景行,应该作为努力向学的目标。很难想象,一个对市场经济理论十分生疏的学者能够妥当地把当代企业家自述、回忆录等文本资料准确运用于改革开放经济史研究之中;同样,若研究者缺乏一定的法学理论相关知识,很难把诸如江平自述这样的民间文本史料妥当地运用于改革开放法制史研究之中。因此,作为改革开放史研究者,只有具备较多的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知识背景,方能有效运用民间文本资料于改革开放史研究之中,否则“就有可能返回历史现场时,迷失于丰富复杂的史料中不能自拔”^[8]。

①参见爱思想网曹锦清个人专栏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caojinqing.html>。

改革开放史研究者除了尽可能扩大知识面,正确把握、理解不同知识背景的民间资料外,还应走出书斋,走向社会,多做一些田野考察,深入基层,亲临改革开放的生动现场,真实感受改革开放在不同领域的具体运行状态,亲眼目睹改革开放实践。甚至有条件者可以与一些民间文本资料研制主体接触、交流、碰撞,以深化对相关民间资料的理解,从而为高效运用民间资料于改革开放史研究增添一些灵动的底蕴。

(二) 妥善对待民间文本内容的分歧性

民众所处的位置、观察的视角以及在社会中具体的利益关系均有所不同,故在日益多元的改革开放史观照下,不同的人及不同的群体对此会有各自的记忆和认知,其所留下的文本资料对于同一问题的看法或许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左。如何对待这些具有分歧性的文本资料,往往考验着研究者的学术识见和治学态度。对此,王海光曾形象地指出,“史学是一门史家与史料合作的艺术”^{[9] P23}。因此,作为研究者须掌握妥善处理的方式及技巧,既不能无视它们之间的分歧,亦不能武断地随意选取某种符合研究者自身价值观、利益观的史料,而应本着真实、客观、准确之原则,或两者兼顾,或经过比较分析,遴选其中一种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文本资料,但宜应对弃之不用的相关民间史料予以分析解释,或至少加以备注。这是因为人们观察历史、记载历史、评述历史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永远不会有统一看法,正是在这种差异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历史的复杂性”^[10]。胡适曾告诫学人,“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地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里去”^{[11] P702}。特别是像改革开放史这样涉及亿万民众的宏大事业,民众参与其间,毋庸置疑,在总体上当然是拥护、支持改革开放事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开放中的每一件事,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大家的理解和认知都是一样的。故从一定意义上说,把那些思想观点具有分歧性的相关民间资料同时纳入改革开放史研究之中,不仅不会有损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相反更能真实、全面、准确地凸显改革开放史的立体画面。

(三) 努力约束和平衡研究者个人情感

民间资料文本内容可能会存在若干分歧,研究者自身亦存在类似情况。由于个人成长历程、利益诉求乃至个人喜好等不尽相同,研究者即使所从事的改革开放史具体领域、研读的民间文本资料等均相同,其所得结论、认知也未必完全相同。而作为史学分支中最年轻、最特殊的——改革开放史,尚在进行之中,其“尘埃还没有落定,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还没有拉开距离,许多现实问题的情感问题和利益因素都会掺杂在这段

历史叙述中,人们大都是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去认知这段历史的,形成了不同的乃至截然对立的观点”^{[9] P17}。这就给改革开放史研究增加了复杂特殊性及很大难度。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是否意味着研究者目前不宜开展对改革开放史研究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虽然研究者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喜好,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可以“完全信任这些属于他个人的东西”相反,作为一名严肃和严谨的研究者,需要有科学的分辨力,随时“极力提防成见、信仰、情绪和好坏支配自己的判断”,并“尽力减轻它们对求真求实的努力的妨害”^{[12] P119-120,122}。也就是说,研究者作为生活在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时空中的个体,研究所经历的历史应该对自身提出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即要始终管控、约束好自身情感等主观性因素。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只要我们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对民间资料和这段历史事实心存敬畏,秉持公平和正义,学术理性和学术良知就会战胜个人情感及个好恶,研究所得结论就会客观、真实、可信,改革开放史研究就会成为“信史”。

三、民间史料与官方史料 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的互济

民间史料固然对改革开放史研究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就可以轻视官方文献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民间史料与官方史料虽地位不同、功能有异,但两者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需认识到,民间史料与官方史料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在很多情况下,两者还存在着互济的关系,故不能就官方史料谈官方史料,也不能就民间史料谈民间史料,而应该把它们共同统一置于改革开放史研究框架之下。

其一,民间史料与官方史料能够互济源于改革开放自身的内在逻辑。西方学术界常把“国家”与“社会”视为官方与民间的化身,似乎两者天然具有二元对立的关系,但“国家”与“社会”在中国的历史实践中并不总是充满着矛盾,两者还有着内在统一的关系。具体到改革开放史研究而言,“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间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演进中始终存在着不少互动合作的情况。比如,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由此开始,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实现了伟大转移。国史、党史在这一历史节点能够出现这样大的转变,不仅取决于当时上层决策者的远见卓识,其背后也有巨大的民意为依托,即历经1966—1976十年浩劫,社会动乱,民心思变,人民思安,党和政府果断启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实乃呼应民意、顺应人心的一种体现。而此后不久由民间探索、推动

产生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等新生事物能够不断主动“冒出来”并顺利“分娩”更是以党和国家所主导的改革开放为大背景,否则恐怕早就“胎死腹中”。在改革开放40年历程之中,类似情况不胜枚举。这就是说,改革开放本身就是“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间互动合作的产物。学术研究源于客观实践,改革开放的实践形态决定了改革开放史研究中的史料运用情况。由此不难看出,民间史料与官方史料能够互济,可以一并纳入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之中,这是由改革开放的内在性质和内在逻辑所决定的。

其二,官方史料有助于对民间史料的识别和鉴定,民间史料有益于对官方史料的理解和把握,两者的互济有助于推动改革开放史研究走向深入。“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每个人都可以对自己所经历的历史进行书写和表达,但个人所经历的历史并不是全部的历史,只是“自身的亲历者”^{[13] P64}。而每个人在相同的历史时空中,因人生际遇不同,“会带来不相同的历史感受和历史记忆”^{[9] P243}。具体到改革开放而言,近年来涌现了不少日记、家书、账本、调查报告等民间文本资料,这些民间记忆从个体的视角诠释着对改革开放的个性化理解。然而,虽然改革开放史研究中民间史料绝不应缺席,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所涌现的各种民间史料都可以不加分析地运用于改革开放史研究之中。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由于民间文本资料研制主体自身的眼界、经历、认知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其对改革开放的记忆和理解,“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以至于影响着人们形成客观的、全面的、正确的国家历史记忆”^[14]。更不用说那些有意作伪、故意扭曲事实真相的民间文本资料。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的报告、公告以及领导人讲话、文稿等综合性、权威性的官方文献为改革开放史构建了“主体和主线、主流和本质”^[14]。在这种情况下,相关民间史料是否可以运用于改革开放史研究,官方文献能够从内容、论点等方面对其加以识别、鉴定。因此,官方史料在很多情况下能够起到澄清一些民间史料失真的内容、纠正一些民间史料错误或失信的论点,从而避免一些民间史料所载的错误信息干扰改革开放史的正常研究。

问题的另外一面还在于,一些民间史料固然存在不少缺陷,却不可因噎废食,即我们应该正视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民间史料对于官方史料的重要意义,以及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①。众所周知,党和国家不少重要文献具有纲领性、总结性特征,这当然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改革开放史,但要想正确、充分地

理解和把握这些官方史料的精髓及要义,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仅仅局限于官方文献自身,并非易事。官方文献虽出自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机关,但因其所关注的问题往往源于社会,与民众福祉息息相关,因此若能结合民间文本资料,有利于对官方文献多一份悟性,从而更好地理解官方文献的内在“语境”,更准确地理解官方文献所蕴含的“微言大义”。因此可以肯定,民间史料与官方史料的互济有助于推动改革开放史研究走向深入。

其三,打通官方史料与民间史料之壁垒,可以构建一个更加完整的改革开放史。有研究者曾强调“从总体来说,中共的历史活动与社会环境呈现出交互作用的关系,即一方面社会环境影响中共历史性活动,另一方面,中共具体的历史活动又反过来影响和变更社会环境。”^[15]这就是说,中共作为一个拥有近百年历史的社会主义政党,其一直以来均深深地扎根于“社会”,立足于民众。无论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中共都按照自己既定的理念和目标在不断地“改造”社会。而“社会”在很多情况下并非是一个单一的接受者角色,实际上,“社会”在不同阶段也以其特有的方式不同程度地“塑造”中共。可以这样说,中共近百年来与其所根植的社会、民众是相互影响、相互规制的关系。具体到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而言,既要看到中共对社会、对民众的影响,也要看到社会、民众对中共的影响,不能仅谈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回避另一个方面。“站在官方看民间,站在民间看官方”,理应成为改革开放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则:即运用官方史料于改革开放史研究时,亦想到与之相应的民间史料存在;运用民间史料于改革开放史研究时,要时刻谨记相关官方史料的重要作用。它们虽“史源”不同,史料的内在属性也存在很大区别,但官方表达与民间记忆对于改革开放史而言,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故需要打通民间史料与官方史料之壁垒,以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改革开放史。

多年来,中共党史“口号化”研究,曾饱受诟病,“比较常见的现象如中央刚出台一项政策,学术界马上就会出笼一大批文章阐释其如何英明正确”,其仅仅“停留在‘口号化’层次,而缺乏‘学理上的充分论证与分析’”^[16]。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党史研究中往往局限于官方史料,孤立地解读官方史料信息,而忽视相关民间史料,缺乏从民众层面对相关政策作历史性的社会层面考察,由于不能察觉政策所蕴含的丰富的社情、民意,其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往往也就缺乏“文化的、学术的底蕴”^[15]。改革开

①究竟何种类型的民间史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参见张学见《影响当代民间史料价值的若干因素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2期)。

放史作为党史、国史园地里一株幼苗刚刚萌生 茁壮成长需待来时 尤应鉴之、避之。

同样 当民间史料纳入改革开放史研究时 也应时刻想着“国家的存在”。实际上 即便像改革开放民众日常生活史这样的选题 除了充分利用民间史料外 亦须时时处处体现官方史料的在场。这是因为 固然改革开放民众日常生活史与传统意义上中共政治史有一定距离 但这并不代表其可以疏离当代中国政治、摆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的影响。否则 仅仅利用民间史料 不注意充分吸纳官方史料之精髓 不能从相关权威性官方资料中看到大历史的脉络和走向 就有可能使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的有关研究走向肤浅化、碎片化乃至片面化。

总之 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中 应兼顾官方文献和民间史料两个层面 由彼及此 由此及彼 相互作用 不分彼此 亦即在官方文献中能时时听到民间声音 在民间史料中能处处看到官方身影。两种资料相互济用 有助于构建一部更加真实、完整的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更为重要的是 当我们真正把这段历史搞清楚后 还可以裨益中华民族在未来的改革开放道路上更加“行稳致远”。

[参 考 文 献]

- [1]施旭.话语分析的文化转向:试论建立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范式的动因、目标和策略[J].浙江大学学报 2008(1).

- [2]黄兴涛.“话语”分析与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J].历史研究 2007(2).
- [3]王石.大道当然[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
- [4]张太原.个体生命与大历史[J].近代史研究 2012(9).
- [5]王海光.回忆录的写作和当代人的存史责任[J].炎黄春秋, 2007(5).
- [6]郑作时.中国首富刘永行自述——希望永行[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 2003.
- [7]张静如.关于《中国当代社会史》[J].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2(4).
- [8]吴秀明.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意义、特点与问题[J].学术月刊 2016(9).
- [9]王海光.时过境未迁——中国当代史采薇[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4.
- [10]高华.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 50 年代历史研究为例[J].南京大学学报 2003(3).
- [11]胡适书信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12]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7.
- [13]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 [14]张星星.正确引领人民大众的国家历史记忆[N].人民政协报 2018-04-05.
- [15]吴汉全 王炳林.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再思考[J].中共党史研究 2014(9).
- [16]宋学勤.科学确立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J].北京党史 2012(1).

Folk historical material should not be absent on the research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ZHANG Xue-jian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Yichang 443002, China)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official documents represented by the leader's chronology, the compilation of documents of CCP and the government's work report, the folk data undoubtedly add a new source of historical data to the study of reform and opening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xpression of folk materials, the awareness of problems, and the vivid conditions that the show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reform and opening history. At the same time, as a researcher,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improve its related knowledge ability as much as possible; To properly treat differences in the content of folk texts, try to restrain the personal feeling of the researchers, which can be properly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by the measures mentioned above. Of course, the folk historical data ha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udy of reform and opening history,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basic and dominant role of official documents can be underestimated. In fact, in many cases,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folk historical data and official historical data in the study of reform and opening history. By this way, it can not only build a more complete hist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but also benefit our nation on the road to reform and opening in the future, which can make our nation become stable and prosperous.

Key Words: folk historical material; Official historical data; Reform and opening history

[责任编辑、校对: 把增强]